

徐乾学、朱彝尊与《永乐大典》辑佚

谢继帅¹

(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, 北京 100871)

【摘要】清代学者最早何时开始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, 向来为学界所重视。前贤认为康熙年间徐乾学已有“辑录《大典》之议”, 甚至将其推为“清代倡议《大典》辑佚第一人”。但从《补刻编珠序》一文看, 徐乾学虽然已经注意到皇史宬所藏《永乐大典》, 并有“刊录颁布”的想法, 但没有明确提出辑佚的主张。与徐乾学过从甚密的朱彝尊曾寻访《永乐大典》, 且收藏过辑自《永乐大典》的易祓《周礼总义》。《周礼总义》可能是清人最早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一部典籍, 但具体辑佚人物、时间和动机尚难考知。《永乐大典》在康熙朝重新受到学者关注, 背景应该是当时官私层面大规模的编纂图书活动。

【关键词】《永乐大典》 徐乾学 朱彝尊 辑佚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Z224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: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 1671-3079(2021)02-0011-04

清代学者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大规模搜辑佚书, 是在乾隆中期编修《四库全书》之时, 目前学界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。但实际上, 早在雍、乾之际, 李绂、全祖望就已较为深刻地认识到《永乐大典》的巨大价值, 并开始了一定范围内的辑佚工作。这方面的具体情况, 近年也逐渐为学界所熟知。那么, 如果把考察的视野再向前推, 是否能发现一些清人讨论和利用《永乐大典》的更早的线索呢?

20 世纪 80 年代, 顾力仁先生曾参考近人李岳瑞的观点, 指出康熙年间徐乾学已有“辑录《大典》之议”,^[1]。其后, 史广超先生更是把徐乾学推为“清代倡议《大典》辑佚第一人”^[2]。他们据以立论的史料, 同为康熙三十二年(1693)徐乾学所作《补刻编珠序》一文:

《编珠》四卷, 隋大业七年著作佐郎杜公瞻奉敕撰也。……詹事江村高公, 偕余奉命校勘阁中书籍, 得之, 已逸其后二卷, 詹士喜而录之。既南归, 则又加之是正, 而博采故实, 以补其阙, 仍为四卷。……阁中书籍, 虞山钱氏以为数代之遗编在是, 而明末多毁于兵火。以余所见万历时张萱《内阁书目》, 存者十不得一二, 犹往往有宋雕旧本, 并皇史宬所藏《永乐大典》, 鼎革时亦有佚失。往者尝语詹事, 值皇上重道右文, 千古罕遘, 当请命儒臣重加讨论, 以其秘本刊录颁布, 用表扬前哲之遗坠于万一。余老矣, 詹事孜孜好古, 能阐幽表微, 幸来日勿忘此言也。^[3]

文中“高公”指高士奇。徐、高二人“奉命校勘阁中书籍”, 此“阁”应为清代内阁, 而阁中收藏的“遗编”, 部分继承自毁于兵火的明代文渊阁。高士奇在校书时, 发现了久已亡佚的《编珠》残本, 其后又博采故实, 将其扩编为四卷。前引徐乾学序文, 即以此事为切入点, 强调了内阁中书籍的珍贵性, 并指出皇史宬所藏《永乐大典》在明清鼎革之际也有佚失, 随后提出“以其秘本刊录颁布”的愿望。细读上下文, “以其秘本”之“其”字, 似是兼指内阁书籍和皇史宬《永乐大典》。若然, 徐乾学的确已经意识到了《永乐大典》的价值, 并有“刊录颁布”的想法。但是, “刊录颁布”能否直接等同于“辑佚”呢? 两者之间似仍有一定的距离。从现存史料看, 徐乾学罕有直接利用《永乐大典》的经历, 未必十分了解书中具体内容和编辑体例, 恐怕难以骤然提出辑佚的主张。再者, 徐乾学此文的重点显然是内阁书籍, 而非《永乐大典》。如果仅仅依据此文就认为徐乾学有

作者简介: 谢继帅(1992-), 男, 山东巨野人,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, 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。

“辑录《大典》之议”，甚至将其推为“清代倡议《大典》辑佚第一人”，可能是不妥当的。

除徐乾学外，朱彝尊与《永乐大典》的联系，也值得注意。嘉庆十七年(1812)，刘权之撰《纪文达公遗集序》云：

……(纪昀)在翰林署斋戒，始于敬一亭上得《永乐大典》。朱竹垞寻访不获，已云：“被李自成衬马蹄矣。”不知埋藏灰尘中，几三百余年也。数月中，每于值宿之暇，翻阅一过，已记诵大半。^[4]

此文提供了一条十分有趣的信息，即朱彝尊曾经寻访《永乐大典》而未获，最终无奈地认为其书已被李自成所毁。刘权之是纪昀的弟子，其描写虽然生动有趣，但意在推崇其师之博学，实际上多有偏颇、夸大之处。¹朱彝尊与徐乾学年辈相仿，过从甚密。徐乾学既然知道《永乐大典》尚在皇史宬处，朱彝尊应该不会不了解。实际上，据朱彝尊《杜氏〈编珠补〉序》自述，内阁中《编珠》残本就是他人抄出的，而且已经看到了徐乾学为高士奇所作的序文。^[5]因此，刘权之的话未必完全可信，朱彝尊完全有可能知晓《永乐大典》的收藏之处，只是一时间无从得见罢了。

康熙十八年(1679)，朱彝尊举博学鸿词科，充《明史》纂修官，又授翰林院检讨；二十二年(1683)，赐居禁垣，充《一统志》纂修官。在此期间，朱彝尊借公务之便，从内阁等处抄录了不少外界罕见的珍贵典籍。²如果朱彝尊曾寻访《永乐大典》，那么最有可能是在此一时期。可惜，朱彝尊在《曝书亭集》中从未提及此事。另外，从现存朱彝尊的主要著述看，如《经义考》《日下旧闻》《明诗综》等，都没有直接利用《永乐大典》的痕迹。但幸运的是，笔者在翻阅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时，见到了这样一条材料：

《周礼总义》不分卷，不著撰人。此书卷端无书名，而每段之注皆冠以“易氏总义”或“易氏曰”字，知为宋易祓。……宋时刻于衡阳，许仪为之序，见《经义考》卷一百二十三，而注云“未见”。……观竹垞、月霄存残本，此书盖已佚之籍也，故《永乐大典》采辑书目中有《周官总义》三十卷。此本无书名，无卷数，所题子目复参差，而每段皆有“易氏总义”数字，其出于采辑无疑，盖《大典》辑本也。第一册有朱竹垞、程瑶田藏印，当是竹垞所移录。……第一册“朱彝尊锡鬯”(朱方)、“程瑶田鉴定”(朱长方)。^[6]

今按，《周礼总义》是南宋学者易祓的代表作之一，原书入明以后已经亡佚，但曾被抄入《永乐大典》。乾隆初年，在李绂的极力主张下，三礼馆曾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将《周礼总义》和其他一大批宋元《三礼》经解抄出，稿本今存国家图书馆，格式与罗振常的描述一致。^[7]也就是说，罗振常的判断是有依据的，这部《周礼总义》抄本确实是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。既然第一册有“朱彝尊锡鬯”朱方印，如果暂时不考虑后人伪造或追盖问题，那么此辑本就应该是朱彝尊生前的收藏品。《经义考》编成于康熙三十八年(1699)，书中著录易祓《周礼总义》而注云“未见”，说明朱彝尊先前尚未见到这部辑本。据此推测，此辑本可能是在康熙三十八年(1699)至四十八年(1709)(即朱氏卒年)之间，被朱彝尊所收藏。

康熙三十八年(1699)至四十八年(1709)间，朱彝尊久居嘉兴竹垞，常出游至苏、杭一带，但未曾北上京师，没有机会直接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搜辑佚书。这部辑本《周礼总义》，可能是他从朋友处获得。可惜，此辑本已经亡佚，今人无缘得见，究竟是何人何时抄录，目前仍然是一个疑问。³

从现存《永乐大典》残本和乾隆三礼馆辑录稿看，易祓《周礼总义》是与王安石《周礼新义》、王昭禹《周礼详解》等混编在一起的。作为宋代众多《周礼》注解之一，易祓《周礼总义》的学术水准和知名程度并不是最高的，至少不会高于王安石《周礼新义》。那么，抄录者为什么会单单把《周礼总义》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而将其他经解弃之不顾？笔者暂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。⁴或许，当时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被辑出的佚书，并不止《周礼总义》一部，只是如今我们没有掌握相关史料罢了。

另需一提的是，湖南图书馆收藏有一部清代抄校本《崇文总目》。近人叶启发撰有一篇跋语：

《崇文总目》一册，秀水朱竹垞检讨彝尊从四明范氏天一阁藏本传抄。后有康熙庚辰(1700)九月竹垞老人手跋。书中有朱笔校字，所据多为史志及《永乐大典》。各书又有“△”、“○”二种标记，护页有朱笔一行云：“《永乐大典》，王尧臣、欧阳修《崇文总目》六十六卷。下引《直斋》一条、《通考》一条、夹漈一条。”又另行云“○者，马考；△者，他书”。亦检讨手笔也。……又检《曝书亭集》中跋《崇文总目》，有“归田之后，以语黄岗张学使按部之日传抄寄余”之语。则检讨所据校之《永乐大典》本，即张氏为之从内府抄出者矣。^[8]

叶启发曾是此抄本的收藏者之一，其跋语将书中“朱笔校字”视为朱彝尊手笔，又谓“所据校之《永乐大典》本，即张氏为之从内府抄出者”。依照此说，朱彝尊曾经以《永乐大典》校勘天一阁传抄《崇文总目》。但实际上，叶启发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。董岑仕先生已经指出，此本避讳乾隆帝“历”字，不是康熙间所抄；书中“朱笔校字”是翁方纲的手笔，与朱彝尊无关；张学使(名希良)寄给朱彝尊的本子，就是范氏天一阁藏本传抄本，与《永乐大典》无关。^[9]因此，叶启发撰写的此篇跋语，完全不能用于证明朱彝尊与《永乐大典》之间的关系。

综上，重新分析《补刻编珠序》可知，前贤认为徐乾学已有“辑录《大典》之议”，甚至将其推为“清代倡议《大典》辑佚第一人”，可能是不妥当的。徐乾学虽然已经注意到皇史宬所藏《永乐大典》，并有“刊录颁布”的想法，但没有明确提出辑佚的主张。如果定要寻出一位所谓的“倡辑《永乐大典》第一人”，笔者认为李绂是比较恰当的人选。其次，参考刘权之《纪文达公遗集序》、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中的史料可知，朱彝尊曾寻访《永乐大典》，而且收藏过辑自《永乐大典》的易祓《周礼总义》。如果后者的考证可以成立，至少可以把《永乐大典》辑佚史向前推30年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李绂、全祖望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之前，有人在康熙年间就已经从其中辑出了一部《周礼总义》。但因史料限制，具体的辑佚人物、时间和动机，目前尚不得而知。《永乐大典》早期辑佚史，仍有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探索。

康熙朝是清代大规模编纂图书的开端。官方层面，康熙帝稽古右文，曾命令或支持编纂了《日讲四书解义》《春秋传说汇纂》《大清一统志》《朱子全书》《全唐诗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一大批典籍。私人层面，徐乾学、朱彝尊等人辑刊了《通志堂经解》《读礼通考》《经义考》《日下旧闻》等书，助推了文化活动的兴盛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，沉寂已久的《永乐大典》重新回到时人的视野并成为图书编纂和学术研究的资料宝库，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

参考文献:

[1] 顾力仁.《永乐大典》及其辑佚书研究[M].台北:文史哲出版社,1985:282.

[2] 史广超.《永乐大典》辑佚述稿[M].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9:16-18.

[3] 徐乾学.檐园文集:卷一九[M]//清代诗文集汇编:124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:504-505.

[4] 刘权之.纪文达公遗集序[J]//清代诗文集汇编:354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:153.

[5] 朱彝尊.曝书亭集:卷四三[M]//王利民,等,校点.曝书亭全集.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9:412.

[6] 罗振常.善本书所见录:卷一[M].汪柏江,方俞明,整理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:8-9.

[7] 张涛.三礼馆辑录《永乐大典》经说考[J].故宫博物院院刊,2011(6):98-130.

[8] 叶启发.华鄂堂读书小识:卷二[M]//湖南图书馆,编.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.长沙:岳麓书社,2011:194-195.

[9]董岑仕.《永乐大典》之《崇文总目》《四库阙书》考——兼论《永乐大典》中四十二卷书目汇编[J]. 古典文献研究, 2018(21下): 188-189.

注释:

1 清人已经委婉地指出:“按《鲇埼亭集》,谢山先生(按:全祖望)尝与临川侍郎(按:李绂)就翰林院同抄《永乐大典》中秘帙,是物色此书不始于文达。或秘阁清严,陈编繁冗,自二公后无问津者,故文达以为创获耳。”参见陈康祺撰、晋石点校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六,第428页(北京:中华书局,1984年)。

2 例如,朱彝尊《跋〈典雅词〉》云:“予分纂《一统志》,昆山徐尚书请于朝,权发明文渊阁书,用资考证。大学士令中书舍人六员,编所存书目,中亦有《典雅词》一册。予亟借抄其副,以原书还库。”参见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四三(收入王利民等校点《曝书亭全集》,第477页,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9年)。

3 罗振常仅据藏书印就推定辑本《周礼总义》“当是竹垞所移录”,此当证据不足,因显然不能将收藏者和抄录者直接画等号。

4 乾隆初年,王文清任职三礼馆期间,曾利用职务之便,再度将易祓《周礼总义》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,交给易宗浚保存。王文清是易祓的同乡后学,易宗浚是易祓的后裔,他们辑录《周礼总义》的目的很明确,即崇奉先贤,保存乡邦文献。比较之下,朱彝尊收藏的这部《周礼总义》抄本,是在何种动机之下被辑出,就显得不是很清楚了。